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四

史记评注



清 牛运震 撰

魏耕原 张亚玲 整理点校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四

史记 评注



清 牛运震 撰

魏耕原 张亚玲 整理点校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评注/(清)牛运震撰;魏耕原 张亚玲 整理点校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8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
ISBN 978-7-80736-992-9

I. ①史… II. ①牛… ②魏… ③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注释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6675 号

史记评注

魏耕原 张亚玲 整理点校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992-9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sqcbbs.com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

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份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前 言

《史记》自成书以来，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汉魏六朝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刘勰、张辅、傅玄、葛洪等，都对《史记》有所评价。虽然这些评论散见于各种著作，未成卷帙，但由此也可窥见《史记》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尤其是在《史记》问世后不久，褚少孙便收集史料对其中残缺的12篇进行了续补，这对《史记》的传播功不可没。此外，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等重要的注释性著作也相继出现。譙周《古史考》则对《史记》中的人名、地名、制度及史实进行了考证、补充。总体而言，汉魏时期是《史记》的续补及传播期，研究则处于萌芽状态，但这些零星的评论，也为后世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唐王朝建立后，注重吸取前代兴亡的教训。在“以史为鉴”观念的支配下，两晋、南北朝的大部分史书得到了补修，《史记》的研究也日渐繁荣。因年代悬隔，且前代的注释性著作多有散佚，促使注释《史记》成为亮点。刘伯庄著《史记地名》、《史记音义》各二十卷，许子孺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王元感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尤其是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堪称《史记》注释史上的里程碑，它们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被称为“《史记》三家注”。对难解字、词的注音和训释，对句义、典章制度和名物的解说及上下文文意的疏通，加上校勘的功力，使得“三家注”当之无愧地成为《史记》学习和研究的案头参考书。除注释外，司马贞、张守节、皇甫湜等人，还对《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给予了高度评价，加之刘知几《史通》对《史记》体例、思想等方面的论述，使得

《史记》史学史上的地位正式确立。此外，韩、柳“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散文的典范，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史记》文学研究的深入。

宋人好议论，在《史记》研究领域，也首开评论之风。三苏、秦观均有《史记》人物论，郑樵《通志·总序》则对《史记》的体例作了评价。早在魏晋时期，班、马异同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至宋代，出现了倪思《班马异同》、娄机《班马字类》这样《史》、《汉》比较的专著。由于受宋学影响，加之处于《史记》专门性评论的起步阶段，宋人的这些评价，虽时见失当之处，但智慧的火花也不时迸射，其筚路蓝缕之功，更不容抹杀。在义理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背景中，考据之作相对较少，以王若虚《史记辨惑》为代表。

元代，虽有戴表元《史记》人物论九篇，罗璧、黄潛等考证《史记》疑义之作，《赵氏孤儿》等杂剧也多从《史记》取材。若从研究角度看，与唐宋相比，则要岑寂很多。

受古文运动影响，明代学者致力于《史记》的选注和评论，其中评点《史记》成就最大。王鏊、何孟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均有《史记》评论专著。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不仅将历代名家的评论网罗殆尽，且诠释《史记》文义、段义、字义及校勘讹误，是明代评点《史记》的集大成之作，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其集评的形式，也被广为借鉴，朱东观《史记集评》，葛蘩、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在体例方面都受到了《评林》的影响。考辨方面，明代也出现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著作，如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骥《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案》等。另有一些笔记著作，如王鏊《震泽长语》、杨慎《丹铅杂录》，也对《史记》史实有一定纠缪。

清初学者继承了明代的评论之风，将注意力投向挖掘《史记》的深文微旨，探寻《史记》的文章之美。何焯《读史记》二卷、方苞《读史记》等，都致力于索隐探微，注重对司马迁述作之旨的揭示；吴见思

《史记论文》则注重对章法结构的把握；汤谐《史记半解》在借重杨慎、茅坤、钟惺、邓以讚等人评论的基础上，兼论《史记》的文章之美以及太史公作史之深意；汪越《读史记十表》，则抉幽显微，阐发各表的主旨、所据、书法、详略等的立义，以此来“窥斑见豹”。此外，“文字狱”的屡兴，使得文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考证古籍中。牛运震《史记评注》（以下简称《评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撰写的。

牛运震，字阶平，号真谷，世称“空山先生”，滋阳县马青（今充州市新兗镇牛楼村）人。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卒于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53岁。跨前清康、雍、乾三朝，历任秦安、平番两县县令，每到一地，威惠甚著，循声大震。官秦安时，开九渠溉田万亩，作农器教民种植之法，并雪多起冤案。其时兼摄徽县及两当县，招募壮丁捕杀二十六虎，徽县多年的虎患得以平息。道遇虎，运震叱之使去，为此，县民绘《驯虎图》以纪异。又祈雨九龙山，并牒城隍庙，为百姓除“毛鬼”之忧。调平番后，画策定固原兵变，捐粟赈五道岷之饥。县民深受感动，制衣具币谢运震，运震退还钱财，接受衣物。最终却因此次“受万民衣”事被弹劾罢官，后闭门治经。

运震之高祖牛天铸、曾祖牛起宗、祖父牛洪范均为贡生，其父牛梦瑞亦为拔贡，官日照教谕。母杨氏，进士杨名采之姊（或妹），叔梦英，河南息县令，精于书画，家风世代敦厚。运震少承庭训，爱经史古文，每有感悟，便手舞足蹈，或大声疾呼；好吟咏，有《烧诗行》。10岁便能诵四经、属美文；17岁时补选为县廪生，以文采出众，声名远扬；23岁即可诵《左传》全文，被选为拔贡生；27岁应顺天试，次年进士及第；29岁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天文、地理、水道、兵法以及诸子百家之文方面，显示出过人的韬略和才华，比当时的硕学饱读之士，亦略胜一筹，但却在次年殿试时，因文章不符合规格落榜，后任边陲秦安县县令。

运震不仅自己一心向学，且重文化传承，官余教诲不倦，每到一处，

便随地设教，历主陇川书院、皋兰书院、晋阳书院、河东书院、少陵书院，讲学深得士心，成就者尤众。因运震曾作秦安县令，该县也被称为“陇石邹县”，上镌“真谷先生讲学处”的石碑犹存于书院旧址。

运震精神健旺，“遇知己谈论，可三五日不寐，故能于书无所不窥”。即使在做官期间，亦未尝废书，加之良好的家教，亲老辞归后，著作日富，著述等身，“以经、史、古文鸣康、乾间”；他去世之后，门人私谥“文定”。因此，在其生前，手稿已广为传播，但仅《金石图》一书刻印问世。没后，《史记评注》、《诗志》、《春秋传》、《论语随笔》、《空山堂文集》等，先后由其子牛钧整理刊刻。此后，嘉庆二十三年，其孙牛敏夫及门人张杜林等编次校对，刊刻了《空山堂全集》，其中包括《诗志》八卷、《周易解》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随笔》二十卷、《孟子论文》七卷、《史记评注》十二卷、《空山堂文集》十二卷、《空山堂诗集》六卷。稍后出现全集的另一版本，增加了牛氏整理考订的《集古录》、《金石集》，而删掉了《诗志》。这些著作，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并在《总目提要》中作了评介。

诸多著作中，《读史纠缪》和《史记评注》涉及史书的考论。其中，前者侧重史学，而后者则侧重文学。《评注》的写作时间，应在乾隆十九年（1754）牛运震赴晋阳主讲三立书院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主讲少陵书院时，是时运震已是垂暮之人。从小饱读诗书，并曾考稽《三国志》、《宋书》、《魏书》、《南北史》、《唐书》、《五代史》，“搜罗逸籍，恢广诵览，博引旁达，错综其事，渐觉黑白明朗”，加上晚年的苦心孤诣，称《评注》荟萃百家、融会贯通，亦并非溢美之辞。

《评注》成书后不久，牛运震便去世了，后来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该作一直沉湮篋笥，直到30多年后的乾隆五十六年，才由其子牛钧组织、张玉树捐资、周允廷助工，付梓开雕。雕刻一半时，张、周二入又先后调离山东，致使工程几废。后由峄县张鲁文寄金续刻，方于乾隆五十八年竣工，前后历时三年。《评注》的版本，则有乾隆五十六年校

刊、五十八年刻成的空山堂藏版，以及嘉庆二十三年编次校对的《空山堂全集》版。

作为被甲科进士出身、先后任峰县县令、胶州知州的张玉树击节不断的著作，《评注》在论史方面自有突出之处，其两大着眼点尤引人注目。首先，牛氏能洞察太史公作史之识力。其评《五帝本纪》曰：“三皇荒远无考，太史公作《史记》断自黄帝，述《五帝本纪》，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王世系》皆叙自黄帝以下，其言信而有征也。百家言黄帝，犹病其不雅驯，而必择其雅者，论次为书首，况于三皇之荒远难稽乎？故知司马贞之补作《三皇本纪》，妄也。”从《五帝本纪赞》本身出发，阐明一本《史记》，立言总不外乎一“雅”字，亦为有识之见。其评《高祖本纪》曰：“本纪之体，难于列传。或谓《高祖本纪》，非《史记》之至者，殆亦有见。缘其叙斩白蛇及上寿太上皇等事，颇不庄重，似非本纪所宜也。然从来本纪不难于庄重，而难于叙次生动，淋漓有情。读《高祖纪》自微时以至起兵，及灭秦、楚，成帝业，迄于沛宫置酒，长乐晏驾，处处有手法，激昂活动而不见有板重之迹。此又《史记》之所以特胜于他史也，不可不知。”以本纪的特点为切入点，在与其他史书的对比中，发现《史记》独特的文学价值。其评《陈涉世家》曰：“《陈涉世家》者，纪刘、项未起之前，陈涉首事，群雄蜂起，并力攻秦之事，而总以陈涉为之纲领，非但纪涉一人之事也。陈涉以匹夫发难，为汉驱除，所遣王侯将相，竟亡秦族，虽列之世家，非过也。且纪涉一人之事，则可世家，可传；纪陈涉首事，群雄蜂起之事，则不编为世家，不可也。《陈涉世家》者，所以著纪事之体，非以尊涉也。”这种评论，虽然在研究方法与范围方面继承了明代何乔新等人的做法，但每每能另辟蹊径，或更进一层。

与此同时，牛氏对前人不尽合理的一些说法也作了纠正。如司马贞《索隐》认为《秦本纪》应降为《秦世家》、刘知几《史通》亦指出“自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评注》则从《史记》的编次

条理入手，以为若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便无从托基，致使前后失序，本末不属。且“始皇称帝后，已尊庄、襄为太上皇，诸侯世家中，亦恐非其伦等”，若列之于世家，亦与史实不符。因此，《索隐》《史通》持论虽有见，但“徒为局外闲观”，“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从体例、史实、《史记》内部记载等多个方面阐明秦不可降为世家的道理，层层透辟，有势有力，如黄河之水，一泄千里，不可羁继。此外，刘知几、王安石等认为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是自乱其例。对此，《评注》辩驳道：“孔子以尼山大圣经纬万古，子孙传继，累叶不绝，可谓以道德、六艺世其家者矣。……萧、曹、张、陈位止通侯、尊非公王而皆世家之，诚以其子孙承继、世守其业也，安在孔子不可比例？且篇中纪孔子宗祖子孙，世次厘然；又叙孔子自少而老，系以鲁君之年，而缀以孔子之岁，及其生卒葬地，郑重而详列之，固俨然世家体矣。……自有史记以后，褒成肇封，爵秩叠加，衍祜承泽，历代罔替，古今世家，孰有过于孔氏者？”笔端有战国策士说辩之锋，深至精到，醒人耳目。

牛氏论史的另一着眼点是对太史公作史微旨的探寻。如认为《乐书》的主旨是“伤古乐之难复，而疾郑音之不可尚也”。其评《吴世家》曰：“《吴世家》于让国之义，三致意焉。”评《孟子荀卿列传》曰：“方正者不容，苟阿者多显，世道齟齬，古今一叹。太史公穷愁著书，其感愤者深矣。”他如《白起王翦列传》“善战者服上刑”，《鲁仲连邹阳列传》太史公因深慕鲁仲连、邹阳之为人而并传，《日者列传》借司马季主面抵宋贾一段发抒垒块不平之气等，都是对《史记》旨意透过一层的开掘。

在述作之旨的揭示中，《评注》显示出了鲜明的特征：将论史与论文相结合。如谓《平准书》曰：“讥武帝好利也。凡指斥时事处，多据实直书，不为深文微词，而其失自见。又往往于结束过接处跌宕呼唤，每作唏嘘感慨之词，盖以深痛武帝耗费之过，才臣聚敛之非，以至国事

日坏，民命益蹙，余祸流弊，恐天下事有不可为者也。一篇之中，惻然三致意焉。”谓《伯夷列传》曰：“只是一‘诞’字，妙在文义若不相属，意思在有无离合之间。以萧瑟之笔，写怨愤之衷，淋漓错综，凄婉高奇。以此首诸列传，真绝调也。”谓《佞幸列传》曰：“佞幸本不足立传，太史公鄙容悦取媚者，故聊为写照，以吐其诙调嫚骂之气，其微词含蓄处，尤极不堪。太史公意中笔底，固不为此辈留余地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待好学深思者探微而知著。

《评注》在把握述作之旨时的另一显著特征，是注重对篇章关键的点醒。如卷七《伍子胥传》评曰：“以赞中‘怨毒’二字为主，篇中屡屡点次报仇雪怨诸事，是一篇极阴惨文字。”并认为所记报仇之事，有正主，有陪客，且“处处点逗，隐映有情”，“是太史公藉端生波、用笔深妙处”。又如卷九“酈生、陆贾俱以说辨胜。《酈生传》‘县中皆谓之狂生’，《陆贾传》‘名为有口（辨）〔辩〕士’，皆一篇精神眼目所系也。”其他如认为“奇计”、“阴谋”是陈平一生功业本领、“大贾人”三字是《吕不韦列传》一篇之纲、《外戚世家》以一“命”字为主等，皆属此类。

论史以外，《评注》评价《史记》的另一着力点在文学方面，其中尤以篇章结构和文法笔力的分析为重点。对于篇章结构，牛氏虽然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如评《廉颇蔺相如列传》曰：“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中间赵奢、李牧纓拂穿插，断续离合，全无牵联之痕。传四人直如一人，此传之奇格变体也。”对《史记》的结构，前人已多精彩评价。因此，牛氏主要将前人关于文章剪裁、结撰等方面未必安妥的评说予以纠正。如针对《汉书·高后纪》所载“高后八年之中，妖祥水旱，选举贬夺及一时行政布令，事迹颇有，《史记》多不之载，亦一疏漏”的说法，指出：“《吕后本纪》一篇大旨，只在吕后王诸吕、危刘氏，以及大臣诛吕安刘之事，故于吕后之封立诸吕、残灭诸王，皆再三详言之。”至于《汉书》所载城长陵、尊昭灵后、桃李华、江水泛滥等事，《史记·吕后

本纪》皆略而不载，都是不愿旁及他端，以滋烦杂。这是识大体、得要领的表现，“可使读者一目了然，知作者注意所存”。并引柳宗元“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以及方苞“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即谓之洁”的说法，认为“《吕后纪》正可见太史公明于体要，而其纪事之精神飞动处，如彼数事，不载何害？”针对柯维骥《平准书》是未竟之书，并认为赞中不叙汉事，似欠结束的说法，认为：“盖平准本汉一代之事，非如封禅、河渠通古今为言者，故开端即叙汉事，而留古事附论于后，以志慨焉，所以借古讽今，而寓微词于武帝。”“篇章次序似乎错乱，而回复倒转，意味深长，感慨无尽。叙事以卜式请烹弘羊结者，正有深切之旨。”并认为柯维骥未能窥见太史公用笔之妙及作本纪原本，是“浅见寡闻”者。如按柯氏之言，将“事势之流，相激使然”一叹置于开端“汉兴，接秦之弊”之前，“不惟意味索然，抑且文理不顺，而卜式请‘烹弘羊，天乃雨’之下，又何可再着一语耶？”皆深入精辟，切中要害。

更进一步来看，如果将《史记》视为一篇大文章，则130篇之间也存在结构上的关联与照应，“互见法”于中起着重要联结作用。对此，牛氏不仅指出一人一事散见各篇的情况，而且指出全书中可互相参看的篇章，如《项羽本纪》与《秦楚之际月表》互载，《酷吏列传》与《平准书》相表里，均以互见的目光去观照。楚、汉，仇雠之国，刘、项，势不两立之人，《评注》评项王败垓下、高祖还沛中，皆“自为歌诗”、“泣数行下”，以为均有深情，写二人歌诗泣下，皆英雄气尽之时。抓住《史记》以情纬文的特征，还原帝王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面对死亡的真实情感。

篇章结构之外，牛氏亦重对篇章艺术特色及句式字法的把握。其中既有对本纪、世家、列传某些篇章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也有对某一章节甚至某一句话的具体评析，还有对提挈、收截、伏应、叠复、隐括、点染、附带之法的揭示，并涉及精彩字法、句法的分析。诸所发明，详

微精到。其论《天官书》曰“有法，有韵，有态；古而灵，奥而动，逸而峭，奇而则。文章格势，凡法与巧皆备于此，令读者惊为异观，爱如宝玩”，谓《司马相如列传》是“雅韵逸情，风流婉媚，别一种笔墨”，指出《酷吏列传》“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肃杀阴惨之气，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吏断狱”，此皆对文章整体风格与文法笔力之概括。谓《秦始皇本纪》“秦法刻深鸷忍，太史公纪嫪毐、不韦二段，笔力廉峭可畏，政与秦法相似，觉有满纸阴惨之气”，以为《天官书》“‘望云气’一段，尤奇变，章法错综，血脉通灵，奥而鲜诡，丽而典括，古今短赋小记之妙”，《赵世家》“叙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一段，文极淋漓激昂；叙武灵王议胡服事一段，文极纵横奇肆；叙公子章等作乱，公子成、李兑等兴兵围主父一段，文极历落缠绵。一篇之中，笔境体格凡数变，而无不工绝”，《魏其武安侯列传》“窦、田、构、郤倾陷乃三传意思注结处，看他历历指数，极力描写，纤悉毫发，详至无遗，神情飞动，栩栩欲活”，此皆对其中出彩章节艺术特色及表达效果的领悟。更为重要的是，牛氏独具慧眼，发掘歌谣的特色，如评高祖《大风歌》曰“雄风霸气，悲壮激昂，真有笼络一世、顿挫千古之概”，《赵王歌》则是“抑郁悲咽，楚骚之遗”，在追根溯源、辨章源流中把握特色。

《评注》对《史记》篇章内部文法笔力的评价，也颇具水准。如谓《项羽本纪》“分封侯王一段，先叙项羽倡议于前，乃点明‘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一语以为总冒，随叙封汉王，而连及封三秦王，钩勒镕炼，结成一片”，此为提挈之法；《魏豹彭越列传》“屡书彭越起事踪迹及其攻取战胜之功，遥遥呼应，自成章法”，此为伏应之法；说《封禅书》“瓠子塞河，以结河决之案；方祠诅胡，以了匈奴之局。皆为前文卷结收拾，以成一篇结构，无一赘蔓闲文也”，此为收截之法；《吕不韦列传》“附嫪毐，鄙夷不韦甚矣。叙嫪毐家僮及舍人，往往与不韦映照，此其用意深处”，此为附带映照之法；评《游侠列传》“鄙人有言曰”，云“此设为诡激之词，愤世嫉俗，若讽若怒，老子所谓‘正言若反’”

也”，此为反辞见意之法；《刺客列传》“‘中桐柱’三字，写匕首余威惊人，纸上火光迸裂”，《万石张叔列传》“太史公描写万石君驯谨处，连用数‘必’字、数‘不’字为章法，参差转换，步步有情有景，极琐曲，极朴厚，极工妍”，此为字法、句法之妙；认为“《垓下歌》，楚声之雄，两‘虞兮’、两‘骓不逝’，叠言有情；‘可奈何’、‘奈若何’，深衷苦调，喑哑中有呜咽之神”，叙写“田氏收赋税于民，施德市惠，此其取齐之本，乃篇中紧要节目，故两次叠叙，不嫌其复”，此皆叠复之法。评《五帝本纪》时，就开宗明义，总论式地提纲挈领说：“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盖他史只是书事，而《史记》兼能写情。情与事并，故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之致。”正是抓住《史记》叙事的规律。好用复笔，前人虽已指出，如洪迈《容斋随笔》，然多就某些篇章而言，未有牛氏如此全面。

《史记》论赞，最具抒情性，《评注》对此评价很高，曰：“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司马贞《索隐》讥其颇取偏引，以为首末不具，褒贬未称，别作一百三十篇述赞，缀于简末。其不知史法与文体殊甚，真所谓爝火于日月，浸灌于时雨者也。”其评论赞风格，常称为穆然敦古、风神逸绝、肃重高古、修洁遒古、曲宕回翔、古拗劲折、精微淡远、顿逸风神、抑扬尽致、吞吐往复、沉悍绝伦、倔强疏挺、平淡萧疏、参差奇崛、傲岸恣肆。子长作史，因物裁质，随方就圆；牛氏作评说，一种论赞，还他一种面貌，可谓善读古人之书。

以上评论，不论是对作史识力、作史微旨的体察，还是对篇章结构、文法笔力的阐释，《评注》都注重把握《史记》雅驯的史学追求，及太史公发愤著书的作史意旨。因此，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虽时显细碎，但终有血脉贯通，细而不至于乱。

在体例上，《评注》借鉴了凌稚隆的做法，多引前人批语，称引的